

基于偏离—份额模型的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分析

李涛 张帅 王刚¹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 重庆 400715)

【摘要】: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稳定性是多个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在分析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时空差异基础上, 运用偏离—份额法, 对 2014—2019 年重庆市涉及扶贫开发任务的 33 个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类型进行划分, 厘清了不同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和增长动力, 最后针对不同收入增长类型区县提出了差异化帮扶政策建议。结果表明: ①研究时段内, 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 且空间分布由非均衡逐步走向均衡, 但在收入结构上仍存在明显空间差异; ②工资性收入是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主导来源, 转移性收入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第二重要来源, 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比重持续处于较低水平; ③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快速增长型和竞争优势推动型区县绝大部分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地区竞争优势是导致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大多数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属于收入增长滞后性和结构优势推动型, 地区竞争劣势损失是造成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滞后的主要原因; ④县域之间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是导致各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 产业扶贫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 F323.8; K90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1) 06-0154-08

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现行标准下, 近 1 亿贫困人口全面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战以来, 贫困地区依靠国家政策支持,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得以快速增长, 收入结构来源趋向多元化^[1-2], 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下, 继续保持收入稳定增长面临巨大挑战。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和结构如何, 关系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质量和成色。2016 年国家《“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 要努力提升贫困人口劳动技能, 实现贫困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 进一步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 确保贫困户收入来源稳定^[3]。精准扶贫工作实施以来,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并成为研究热点。学界关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①贫困人口收入分布变化, 部分研究学者从贫困人口收入变化情况入手^[4-5], 对贫困人口收入分布和变动情况进行了探究, 得出了调整扶贫标准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建议^[6]。②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主要包括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和微观贫困人口个体特征。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主要涉及自然资源禀赋^[7-9]、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0-11]、收入分配制度^[12-14]、基础设施完善情况^[15-16]和精准扶贫政策^[17-20]等方面, 微观个体特征的影响主要包含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21-23]、家庭劳动力情况、健康状况^[7, 24]以及家庭经济活动^[25-29]等方面。③收入结构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7, 30-33], 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贫困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资性收入^[7, 32], 但在部分地区政策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比逐渐提高, 而以转移性收入为主要增收来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31], 脱贫后返贫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20XJJCZH005);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8BS86); 西南大学博士启动基金 (SWU118047)

作者简介: 李涛 (1986—), 男, 四川雅安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规划、农村贫困治理。E-mail: 503245408@qq.com

综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对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针对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的系统研究较少，缺乏从收入结构视角研究结构优劣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方法较为传统，大多以回归分析来研究影响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的因素；三是研究尺度多以微观农户为主，较少以国家扶贫开发地域单元——县域，作为研究对象。重庆市是西部内陆开放高地，成渝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涉及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也涉及长江上游重要生态保护区，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与巩固脱贫成果的考验。当前重庆市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部分脱贫农户仍然存在一定的返贫风险。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解决以下问题：重庆市县域层面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和结构时空演变特征如何？不同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和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如何从县域层面推动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增长？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偏离—份额模型^[34-37]，刻画重庆市 2014—2019 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变化规律及空间分异特征。偏离—份额分析法是以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及来源作为参照系，把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视作动态变化过程，并将研究时段内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变化拆分为增长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地区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解释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的优劣势及增长或衰退的原因，进而设计县域未来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增长路径。

假设某区县 2014 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来源 i 的水平为 b_{i0} ， b_0 为区县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经过 t 年，某区县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来源 i 的水平为 b_{it} ， b_t 为区县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水平； B_{i0} 为 2014 年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来源 i 的水平， B_0 为 2014 年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经过 t 年，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来源 i 的水平为 B_{it} ， B_t 为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研究时段内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 i 的区县变化率 r_i 和重庆市变化率 R_i 分别为：

$$r_i = (b_{it} - b_{i0}) / b_{i0}, R_i = (B_{it} - B_{i0}) / B_{i0} \quad (1)$$

为排除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速与重庆市增速间差异的影响，引入标准化量 b'_{i0} ，按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各收入来源所占份额，得到区县各收入来源的标准化规模，即：

$$b'_{i0} = b_{i0} \times (B_{i0} / B_0) \quad (2)$$

各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 i 的增长量 G_i 由区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份额分量 N_i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偏离分量 P_i 和竞争偏离分量 D_i 构成，即：

$$\begin{aligned} G_i &= N_i + P_i + D_i, I_i = P_i + D_i \\ N_i &= b'_{i0} \times R_i, P_i = (b_{i0} - b'_{i0}) \times R_i \\ D_i &= b_{i0} \times (r_i - R_i) \end{aligned} \quad (3)$$

式中： N_i 表示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 i 按重庆市平均增长率的增长变化情况； P_i 表示剔除区县和重庆市之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增速差异后，收入结构对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的贡献，值越大说明贡献越大； D_i 是指区县和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 i 的增速二者之间差异所引起的偏差，是除收入结构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的贡献，值越大表明

该项收入来源的竞争力优势贡献越大；P 和 D 分别为结构偏离分量值和竞争偏离分量，总偏离份额 I 为表征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优势和其他竞争因素优势的相互促进或冲抵作用。

1.2 数据来源

以重庆市涉及扶贫开发任务的 33 个区县为研究区域，其中城口、丰都、万州、黔江、开州、云阳、巫溪、石柱、奉节、巫山、武隆、彭水、秀山、酉阳、涪陵、潼南、南川和忠县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北碚、渝北、江津、永川、长寿、垫江、荣昌、璧山、合川、巴南、綦江、大足、梁平、铜梁和万盛经开区为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研究对象为重庆市 2014—2019 年各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及来源组成，数据来源于重庆市扶贫办，图形数据源于重庆市规划与自然资源管理局。

2 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时空表征

2.1 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时间特征

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 4681 元增加到 2019 年 10938 元，年均增速达 18.50%，高于同期重庆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约 9 个百分点，收入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从县域层面来看，2014 年县域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低于 5000 元的有 16 个，主要分布在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比 48.48%，而 2019 年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最低的是彭水 8986 元，有 26 个区县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超过 10000 元，占比 78.79%，县域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9678 元。具体来看，县域间人均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分别缩小了 10685、580 和 251 元，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县域之间差距扩大了 190 元。总的来看，各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总体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区县间差距进一步缩小，这主要得益于脱贫攻坚以来重庆市加大了对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投入力度。

从收入构成来看，研究时段内人均工资性收入从 3238 元增加到 8408 元，比重由 69.17% 增至 76.87%，反映出工资性收入是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主导来源和重要驱动力，而这主要归因于就业扶贫工作的有力推进；此外，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虽有所增长但占比逐年下降，从 702 元增加到 976 元，比重由 14.99% 降至 8.92%，贫困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来源以种养殖等农业收入为主，但由于外出务工的贫困人口增加以及农业比较效益长期低下，导致贫困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受到一定影响；转移性收入由 691 元增加到 1471 元，从 2015 年起转移性收入取代了经营性收入成为贫困家庭收入第二重要来源，这主要得益于社会保障兜底政策的实施，有效保障了特殊困难群体收入增长；财产性收入比重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图 2），对贫困人口增收作用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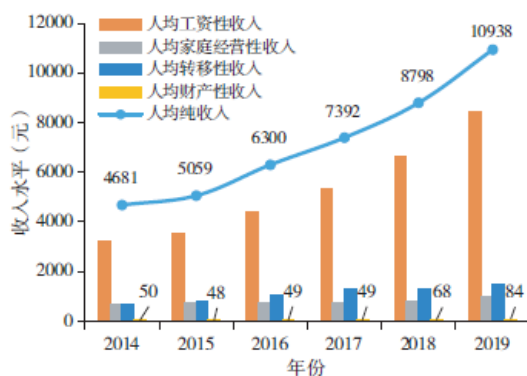


图1 2014—2019年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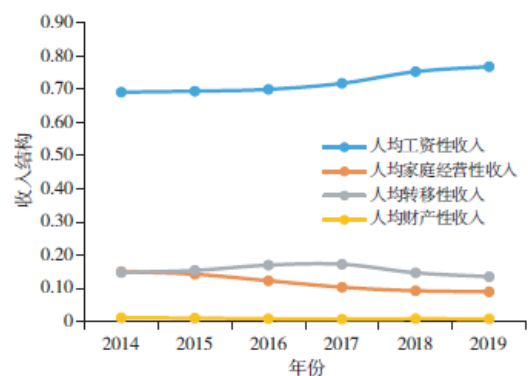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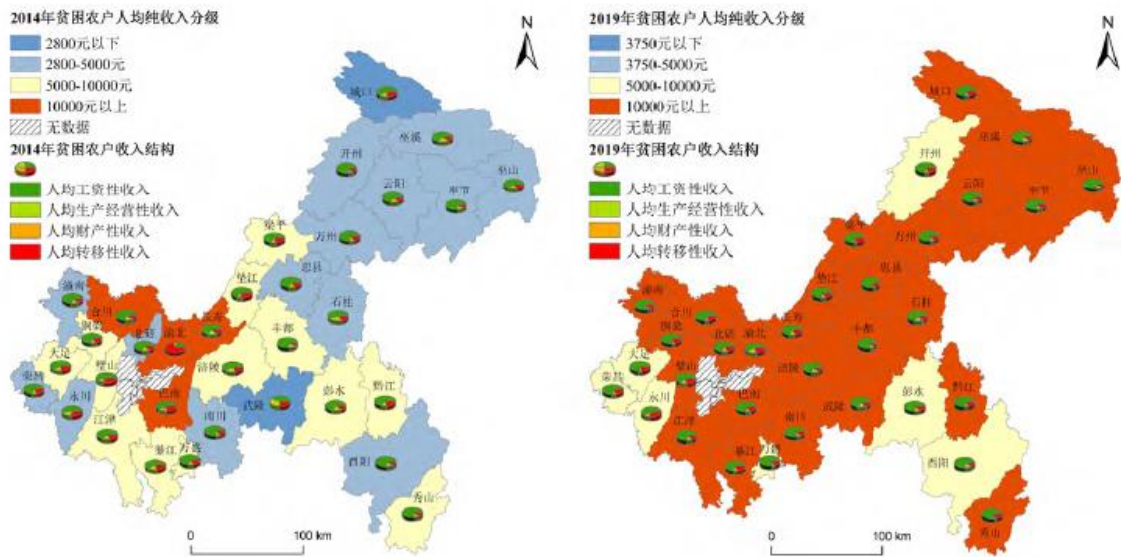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19年重庆市贫困人口收入结构

2.2 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空间特征

由于各区县贫困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上的不均衡，以及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的个体差异性，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与结构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为了使区县之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PI）具有可比性，借鉴已有文献和现行政策，并结合数据样本特征，选择当年国家扶贫标准、脱贫监测户标准（5000 元）和 10000 元三个收入节点将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划分为四类：① $PI < \text{当年国家扶贫标准}$ ，贫困人口家庭经济状况差，贫困程度深；② $\text{当年国家扶贫标准} \leq PI \leq 5000$ ，贫困人口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脱贫不稳定；③ $5000 < PI < 10000$ ，贫困人口家庭情况和脱贫稳定性一般；④ $PI \geq 10000$ ，贫困人口家庭经济状况较好，脱贫稳定性较高。

通过 ArcGIS10.2 软件对重庆市 2014 和 2019 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与结构进行空间可视化（图 3）。由图 3 可知，2014 年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渝北、北碚和长寿等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而渝东北和渝东南所涉及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其中最低为城口，主要原因在于城口县地处秦巴山区腹地，交通闭塞、资源禀赋不足，生态环境脆弱；2019 年，研究区内除开州、酉阳和彭水等 7 个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介于 5000~10000 元之间，其他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均在 10000 元以上，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空间分布基本呈均衡分布。



注：该图基于重庆市标准地图（审图号：渝S（2020）079号）绘制，底图无修改。图4同。

图3 2014和2019年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和收入等级划分

3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偏离—份额分析

3.1 收入结构偏离—份额总体比较

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不断增长，累计减贫 165.77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12%。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变化率、增长量及总偏离份额量来看，各区县均存在较大差异。纵向来看，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在研究时段内变化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有 14 个区县，其中云阳县最高，为 304.47%，总偏离份额 I 值位居 33 个区县之首，为 6271 元，收入增长量仅次于北碚区的 8935 元；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变化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区县有 19 个，主要集中在渝西和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其中渝北区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变化率最低，为-29.57%，是唯一收入变化呈现负增长的区县，其增长低于份额分量 22616 元，主要原因在于收入结构变化。精准扶贫工作初期，渝北区依靠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对贫困户采取“输血式”帮扶，使得转移性收入在 2014 年

3.2.2 收入增长滞后型

收入增长滞后型区县涉及璧山、巴南、渝北、大足和綦江 5 个区县，均分布在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区县，其中劣势损失最为严重的是渝北区，结构劣势损失和竞争劣势损失分别为 7089 元和 15527 元。从竞争偏离分量来看，这类区县贫困劳动力用工成本高，且贫困人口中“老弱病残”居多，在工资性收入方面竞争偏离分量劣势明显，以致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竞争偏离分量为负；从结构偏离分量来看，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偏离分量为负的主要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结构劣势明显。总的来看，较大的收入竞争劣势是导致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3.2.3 结构优势推动型

结构优势推动型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主要是依靠工资性收入的结构优势效应，涉及铜梁、荣昌和梁平等 10 个区县，主要分布于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结构优势最高为秀山县 1036 元。这类区县推动贫困人口增收的主要驱动力为收入结构优势，但其优势不足以抵消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竞争劣势损失，所以结构优势推动型区县中大多数区县的增长量低于份额分量，且二者差距较大，如长寿、垫江和彭水等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最为滞后。

3.2.4 竞争优势推动型

竞争优势推动型区县涉及城口、武隆、巫山、石柱、永川和涪陵 6 个区县，主要分布在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从竞争偏离分量来看，除涪陵区外其他 5 个区县竞争优势明显；从收入结构偏离分量来看，除巫山县以外，其余 4 县工资性收入结构劣势是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劣势主要来源；除涪陵区外，其余 4 县均为竞争偏离分量优势大于收入结构份额偏离分量，这也是该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3.3 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偏离—份额比较分析

由于区域贫困程度以及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不一，各区县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等方面投入力度也存在差异，因此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性。

3.3.1 工资性收入偏离—份额比较

2014 年以来，得益于就业培训、东西部劳务协作和农村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就业帮扶政策，农村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对收入增长贡献最大。工资性收入结构偏离分量为正的区县包括秀山、丰都、合川和开州等 23 个区县，其中秀山县结构优势最高为 1378 元；城口、綦江和渝北等 10 个区县结构偏离分量为负，渝北区结构劣势最为明显达 9711 元。工资性收入竞争偏离分量县域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具备竞争优势的 14 个区县中除北碚和永川外，均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表明绝大部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普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大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贫困劳动力成本较非重点县更具竞争优势，加之脱贫攻坚政策的倾斜，使得贫困人口就业务工机会增加；具有竞争劣势的 19 个区县中除开州、酉阳、黔江、彭水和秀山外，均为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表明绝大部分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普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这类区县贫困劳动力成本较高，竞争优势不明显，另一方面这类区县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和缺劳动力占比较高，使得贫困人口在就业务工方面受到限制。

3.3.2 家庭经营性收入偏离—份额比较

实地调研发现，尽管各地出台了一系列产业到村到户扶持政策，但产业到户政策仍以“短平快”的养殖业为主，出栏牲畜多为自家食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部分规模产业发展周期较长，在面临技术和市场等风险影响下，无法在短

期内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快速增长。分析结果表明，结构偏离分量数值介于-310~168元之间，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结构的优劣势并不明显，其中忠县、渝北和酉阳等17个区县家庭经营性收入结构偏离分量为负，结构偏离分量为正的区县主要分布在农业产业基础较好的渝西地区和部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域家庭经营性收入竞争偏离分量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对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起到正向作用的有19个区县，竞争优势最高为渝北830元，其中除北碚、渝北、荣昌、璧山和垫江外，其余14个区县均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类区县前期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在产业扶贫政策强力推动下，发展趋势向好，有效推动了贫困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因而绝大部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速普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有14个区县竞争偏离分量为负，损失最高为合川区1303元，除黔江、潼南、彭水和秀山外，其余10个区县均为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表明绝大部分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普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这类区县虽然农业产业基础好，但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维持在一定水平后增长后劲不足，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3.3.3 财产性收入偏离一份额比较

由于各区县贫困人口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相互之间差距不大，其结构和竞争偏离分量对收入增长贡献不显著。财产性收入结构偏离分量为正的区县涉及巴南、璧山和潼南等8个区县，但结构优势并不明显，另外大部分区县财产性收入结构偏离分量为负；财产性收入竞争偏离分量介于-100~100元之间有26个区县，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贫困人口所持有的生产要素较少，市场意识也较薄弱，加之农村土地产权不清和山区土地资源破碎化也阻碍了农村土地大规模流转，导致大多数区县财产性收入竞争优势并不突出。

3.3.4 转移性收入偏离一份额比较

随着农村低保标准线与贫困标准线有效衔接，农村养老保险和残疾补贴等综合保障政策的实施，农村贫困人口转移性收入增长明显。转移性收入结构偏离分量为正的有8个区县，除渝北区结构优势明显外，其他区县结构优势并不明显；转移性收入竞争偏离分量为正的有26个区县，说明绝大部分区县农村贫困人口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农村低保标准线与贫困标准线有效衔接后，农村低保标准得以提升，贫困人口中因残和因病等特困群体享受农村低保比例也大幅提高，使得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转移性收入竞争劣势为负的区县有7个，其中渝北、巴南、璧山和垫江竞争劣势较为明显，说明这类区县农村贫困人口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全市平均增长水平，主要原因在于这类区县贫困人口属于“插花式”贫困[38]，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和缺劳动力比例较高，在脱贫攻坚工作初期基本都已享受了社会兜底保障政策，且随着产业扶贫和就业等扶贫政策的持续推进，部分贫困人口的其他收入来源有所增长，逐步退出农村低保，因此家庭转移性收入增长有所放缓。

4 结论与讨论

随着各类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见效，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呈上升趋势，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空间分布由非均衡逐步走向均衡，但在收入结构上仍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工资性收入是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促进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转移性收入已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第二重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则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对农村贫困收入增长作用有限；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类型来看，重庆市绝大部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收入快速增长型和竞争优势推动型，收入的竞争优势是导致这些区县农村贫困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大多数扶贫开发工作非重点县则属于收入增长滞后型和结构优势推动型，收入的竞争劣势损失是导致这些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滞后的主要原因；县域之间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偏离分量优劣势不同，是导致县域之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基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类型及背后驱动力的不同，本文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4.1 收入快速增长型

收入快速增长型区县，应进一步完善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帮扶体系，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平台，实现贫困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精准对接，确保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继续稳定增长；加快农业产业化建设，完善区域产业体系，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山地特色农业，扩展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的增长空间。

4.2 收入增长滞后型

收入增长滞后型区县，涉及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较少，且多以“老弱病残”为主，劳动力偏弱。因此，可积极多方筹措资金，进一步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家庭弱劳力和半劳力，拓宽农村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来源；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带贫益贫利益联结机制，对无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可采取“土地入股分红”和“托管代养”等模式，有效增加其收入来源；此外，应加大财政转移性支付，实现转移性收入稳步提高，筑牢政策兜底保障防线。

4.3 结构优势推动型

对于结构优势推动型区县，一方面应持续推进就业培训等工作，提升贫困劳动力技能水平，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和巩固产业发展成果，延伸产业链，积极将产业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贫困人口产业增收和县域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持续推进土地流转工作，实现产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健全贫困人口产业发展“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帮扶机制，做好应对自然灾害、市场等风险防控方案，努力提升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4.4 竞争优势推动型

针对竞争优势推动型区县，应最大限度利用贫困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承接主城区产业转移，建立扶贫车间，拓宽就业渠道，以有利于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根据区县实际情况，合理配置资源，培育支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特色产业，推进资产收益扶贫，有效增加财产性收入；针对无劳动力或丧失劳动力的贫困人口给予政策兜底保障，最终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来源多元化和稳定增长。

本研究从收入结构的角度，运用偏离一份额法对重庆市具有扶贫开发任务的33个区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类型和收入增长的来源进行了划分和解析，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县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增长，进一步缩小区域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差距提供工作思路。下一步可从区域空间角度，对县域之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的空间效应和导致县域贫困人口收入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开展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朱方明. 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构成看如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2):5-11.

[2]丁建军, 宁燕. 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多样性特征及其对贫困的影响[J]. 地理科学, 2016, 36(7):1027-1035.

[3]国务院.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2/content_5142197.htm, 2016.

[4]陈云, 王浩. 核密度估计下的二分递归算法构建及应用——测算特定收入群体规模的非参数方法拓展[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1, 26(9):3-8.

[5]陈娟. 我国城镇贫困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收入分布拟合及分解模型研究[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0, 40(19):

[6]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基于非参数核密度方法图解[C]//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暨宏观经济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11.

[7]马伟东,刘峰贵,周强,等.西部山区贫困人口的收入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都兰县为例[J].青藏高原论坛,2018,6(3):102-106.

[8]胡尧,严太华.资源依赖:增长诅咒还是贫困陷阱?[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4):137-146.

[9]刘伟,徐洁,韩秀华,等.生态脆弱区农户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系研究——基于陕南安康市1404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32(9):19-25.

[10]李小云,于乐荣,齐顾波.200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一个全国和分区域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4):4-11.

[11]庞丽媛,马晓钰.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与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地区为例[J].西北人口,2018,39(1):119-126.

[12]陈菲.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2019(10):73-74.

[13]李秀芬,姜安印.亲贫式增长刍议: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取向[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162-168.

[14]张永丽,宋健.收入增长、收入分配与农村贫困——基于甘肃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7,34(6):26-31.

[15]谢申祥,刘生龙,李强.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8(5):112-131.

[16]Victor Medeiros, Rafael Saulo Marques Ribeiro, Pedro Vasconcelos Maia do Amaral. Infrastructure and household poverty in Brazil: A regional approach using multilevel models[J]. World Development, 2021, 137:105118, DOI: 10.1016/j.worlddev.2020.105118.

[17]谢玉梅,丁凤霞.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下的就业扶贫影响效应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21(3):18-32.

[18]Yu J, Han X, Chen B Z, et al.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icrocredit on the income of poor households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evidence from China[J]. Agriculture, 2020, 10(7):0293, DOI: 10.3390/agriculture10070293.

[19]Wu L, Jin L S. How eco-compensation 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a perspective from different income group of rural households in Guizhou,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75:122962, DOI:10.1016/j.jclepro.2020.122962.

-
- [20] 胡晗, 司亚飞, 王立剑. 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78-89.
- [21] 李振宇, 张昭, 刘浩. 农村教育结构变迁与收入贫困改善的系统研究[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2):98-103, 137.
- [22] 李玉恒, 宋传焱, 阎佳玉, 等. 转型期中国农户生计响应的时空差异及对乡村振兴战略启示[J]. 地理研究, 2019, 38(11):2595-2605.
- [23] 邢小燕, 李世平. 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山西省吕梁市为例[J]. 广东农业科学, 2010, 37(2):250-254.
- [24] 高星, 姚予龙, 余成群. 西藏农牧民贫困特征、类型、成因及精准扶贫对策[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328-336.
- [25] 杨晶. 农业收入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影响[J]. 统计研究, 2015, 32(1):110-111.
- [26] Imai K S, You J. Poverty dynamic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China: identifying multiple pathways for poverty transition[J]. Discussion Paper, 2011.
- [27] 张磊, 伏绍宏. 劳动力转移促进还是抑制了贫困户脱贫?——基于凉山彝族聚居区 237 户农民的调查[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5):55-63.
- [28] 樊士德, 朱克朋. 农村劳动力流动、务工收入与家庭贫困——基于东部欠发达县域 878 户农户的实证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6):26-33, 58.
- [29] 沈扬扬.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的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12(2):131-150.
- [30] Wang Y S, Chen Y, Liu Z J.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agropastoral transition zone of north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Yulin City[J]. Sustainability, 2020, DOI:10.3390/su12104187.
- [31] 李明桥. 贵州山区收入结构对农户贫困状况的影响——基于普定县 3 个行政村的农户调查数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6(6):131-140, 156.
- [32] 吴奶金, 庄子豪, 林萍萍, 等. 贫困家庭收入特征、增收困境与可持续减贫策略研究——基于宁德市 433 户调研样本[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1(4):20-26.
- [33] 江克忠, 刘生龙. 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8):75-90.
- [34] Creamer D. Shift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national resources[R].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95-97.
- [35] Dunn J E S. A statistical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 for regional analysis[J].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60(6):97-112.

[36] 万年庆, 李红忠, 史本林. 基于偏离—份额法的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演进的省际比较[J]. 地理研究, 2012, 31(4): 672-686.

[37] 丁建军. 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民收入增长及演变特征的县际差异[J]. 经济地理, 2014, 34(10): 137-143.

[38] 李涛, 张帅, 廖和平. 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探析[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0, 42(4): 1-11.